

JIWANJI LIANGBIN ZHU

◎ 梁斌 著

河间文集



集外集

梁斌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傅小北

封面设计：唐伟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集外集/梁斌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3

ISBN 7-5006-1508-6

I. 集… II. 梁… III. ①梁斌-文集②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IV. I267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970 1/32 4.5印张 2插页 58千字

1994年8月北京第1版 199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5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著名作家梁斌继《笔耕余录》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之后的又一本散文、随笔和文艺论文集。其中有对自身艺术观的阐述，从事革命活动和文学创作的回忆，对青年艺术工作者的培养，以及对改革开放后新生活、新事物的歌颂，表现出一位老作家在新时期的崭新精神风貌。文笔生动，思想深邃，令人回味无穷。

目 录

保二师——革命的摇篮	(1)
我再也不为难了	(4)
话黄胄	(9)
饮食的传统艺术	(14)
绿色的晴光	(19)
摆摊的老教师	(23)
摆摊闲话	(27)
友 情	(31)
栩栩如生的风俗画廊	(35)
新年话家常	(40)
白杨之歌	(42)
在治脚室	(46)
悼丁玲同志	(50)
北方昆曲的崎岖道路	(53)
复康学忠同志	(62)

且说卖画	(68)
谈“捧角”	(71)
有感于输液治感冒	(74)
我在深入生活	(82)
我的文学观	(92)
写给爱好文艺的中学生	(100)
谈谈语言问题	(103)
写一部好书	(106)
复张兰允	(113)
民族气魄与民族风格	(117)
我和画	(121)

从《一个小说家的自述》到《集外集》

——跋

王维玲

..... (125)

保二师——革命的摇篮

保定第二师范是个革命的学校，但是最难考。我为了投考第二师范，补习了半年的功课，〈难题三百解〉都背熟了。考试的时候，二千五百人下场，录取了四十个人，我考在第十三名，真不易呀！

秋季入学，入第十二班。老同学朱瑞祥介绍我参加了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继续奔向革命的征程。我在高小时期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反割头税运动。考入二师并不觉得满足，我要继续革命；那时我还不懂得转关系，一九三一年的春天，我又参加了共青团。

当时白色恐怖严重；校长张陈卿是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训育主任是国民党的改组派，稍一不慎，就有被开除学籍的可能，于是我懂得了绝对保守秘密；我是团小组长，小组会每礼拜开一次，找不到地方开会，就在操场上散步，一边走着一边谈。要汇报工作，汇报思想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母校

我过了严格的组织生活，读了《毁灭》、《夏伯阳》、《铁流》、《士敏土》……等，好多革命文学，我立志做一个革命作家、著述家，在这时已经开始努力了。

一九三一年暑期，我参加了保二师的第三次学潮斗争，驱逐贪污校长张陈卿。我是护校委员会的一个；半夜三更时分，电灯忽明，召开了学生大会，宣布了张陈卿三大罪状，派出两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赴天津，到河北省教育厅告状。一个代表团到北京，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说明二师学潮真相，争取社会舆论。

河北省教育界，有留法派和留美派的斗争，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教育厅撤换了张陈卿，我们欢迎开明校长张云鹤来校。

驱逐张陈卿的胜利，带来了思想大解放，各种会社如雨后春笋；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世界语学会、武术会相继成立。我参加了文学研究会，读了很多革命文学。

后来，我读书的兴趣转移了。读了几本社会科学概论，《文学概论》、《辩证唯物论》、《社会进化史》、《政治经济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时读这些书，有的读懂，有的读不懂，但是此后一遇到实际问题就懂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炮轰沈阳北大营兵工厂，同学们等不得下课，一齐拥进图书馆，有人拿起报纸，立在桌子上，高声朗诵。日寇在东北点起战火，同学们举起拳头，高声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祖国万岁！”

自此，我投入抗日救国的高潮。每日下午课毕，携带宣传品深入工厂、农村，告诉工农大众，我们的祖国到了危亡的关头，唤醒广大群众起来抗日救亡。我参加了粉笔队，上大街书写标语……画白了保定市的墙壁。参加了南大桥码头工人工作，检查日本货。参加了南大桥飞行集会、西郊飞行集会，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东北大片土地，很快沦失，东北同胞被踏于日寇铁蹄之下。蒋介石为了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在保定设立“行营”，开来宪兵第三团。

统治者宣布将有兵乱，提前放假。同学们回家之后，又宣布解散第二师范。自此，我即失学失业，走上社会，开始文学青年的生活。为时不久，我即参加了抗日战争，经过了八年抗战。

我再也不为难了

编者给我出了“三十五年间的一件事”这么一个题目，正对我心上的事。这几天，我正想着这件事：

我姊妹弟兄十人，我排行第十。子女八人，大孩子正在上中专。二孩子正在村里种地，当社员。三孩子上大学，第四个孩子和第五个孩子正在上中学。第六个孩子上小学。最小的孩子，还在幼儿园。

正在此时，我的家乡，一九五四年大水。一九五五年又是一场大水。我的家乡，在潞泷河与鹿河之间，历年在水旱之间。这时，我的五哥向我四哥大哭，说他的日子无法过，没有饭吃。这时四哥还在保定工作，是个一般干部，搞水利的。他给我来了一封信，一是说明他是怎样做的，每人给了几元钱。问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呢？只有过俭朴生活呗！

当时大哥大嫂已经去世，不需要我照顾。二哥健在，三哥健在，大姐健在。二姐在北京，姐夫是河北省政协委员，还能过得去。三姐还活着，四姐还健

在。都需要我照顾，只可说是照顾，当时我是一个十一级的干部，没有别的收入，还能怎么办呢？做弟弟的只有每人每月寄几元钱给他们，打个油买个盐的，不能有更多的帮助；我的一家人，负担已是够重的。

谁知正在此时，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青菜和猪肉按两配售，我爱人的体重降到一百一十五斤，我的心脏出现早搏。这时，使我负担更加沉重。但愿天不灭人，五八年底，我出版了第一本书《红旗谱》，国家救了我，自此以后，每家每月寄一二十元，二三十元不等，不能更多，因为我还得考虑我的将来，我的孩子们还得上学读书，他们也要吃饭。

这部《红旗谱》一出，我的名声就大了，成了“有钱的人”了，朋友们也向我伸出手来，说：“有一万人想着梁斌的钱！”可是，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有求教的，不超过二百元，老朋友们，少了也拿不出手去。范围是只有过去在一块工作过的；最多的不超过三百元，最少的也只一百。在这几年里，也确实有些朋友生活有困难。

事情也不尽如人意，有的老朋友夫妇都是高级干部，竟然也刮过风来；有个老朋友把我请到北京饭店，吃了一顿简单的便饭，说：“你拿出一点钱来吧！”我诚恳地向他说明，我得的稿费并不多，负担很重，

回避了。我想这不是要一点钱，这是要上千的钱。此事，直到“文化大革命”后，那个朋友才跟我说：“那时有人说，咱们得跟梁斌借钱哪！”不用说，这人的用意是可知的。

也有的朋友，或明或暗发出热言冷语，颜色也不对。我请羽时同志从侧面打听了一下，他回来说：“他敲着要！”这位老朋友竟然向我敲竹杠！当然，我也知道他有困难，夫妇二人工资不及二百元，六七个孩子，生活是有困难的。也有的朋友张嘴太大，使我无法回答。

姊妹弟兄之间，也出现问题：大姐和三姐，都到七八十岁，过不去“艰年”，也辞世了。我的二姐丈，月入一百三十元，也给我三哥和四哥写信：梁斌有钱，我没花过他的。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有的弟兄说：“为什么给他多，给我少呢？”有两个重外孙要求盖房，我未答应，因为这辈人太多。

这种情况到一九六四年，中央政策有所调整，弟兄们都有了饭吃，才停止了。但是，对我在农村的儿子，还多少给与帮助，有这么一条路，他是忘不了的。

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把我关起来，每月生活费发三十元，别人也就不想着了。“文化大革命”过去，家里的孩子我还是照顾的，因为已经

有了一个孙女，两个孙子，人口多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实行，我的儿子当年就包了十亩棉田，这一年，他就分了一千元，三千斤玉米棒。随后几年，每年承包六七亩棉花，有了棉花就有钱，还补助粮食、化肥、棉籽油，每人十八斤，现在农民都是用大缸盛油。今年，我的孙女出嫁，孙子结婚，就没跟我要钱，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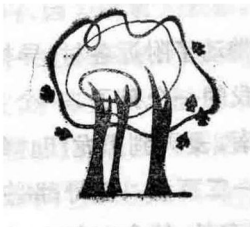
离我村不远有个辛兴镇由于落实政策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出去两个盖房班，收入比较多。和北京的一个工厂订下合同，每年给多少腈纶线下脚料，加工腈纶线，姑娘媳妇们、男孩子们长途贩运，赚钱不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干起来，成立了四个毛纺厂（其中一个混纺厂），四个批发站。现在孩子们中学毕业就可以上班。还盖上电影院，家家吃上自来水。

这样一来，带动了附近各村，异样的繁荣。我三哥的两个孙子，我的一个孙子，一个孙女，都“跑”腈纶线；冬天至云南，夏天到黑龙江。每次出去一趟，除路费以外，赚一二百元。三哥翻盖了四间房。各家都有二三元存款，粮食三年吃不完，如今农家都是吃细粮，把玉米卖出去。

我县有个留史镇，自古是皮毛集散之地；带动全县农民“跑皮子”长途贩运。我侄子的几个儿子，跑西口，贩运皮张，据孩子们说，他已经成了万元户。

自此以后，弟兄们老了，可以娱晚年了。儿子、侄子侄女们也不来了。这是三十五年来的一件大事；我本来没有多少钱，自此以后，也就不左右为难了。

美中不足的是：我的大儿子因病去世，给我留下一个孙女，两个孙子。大儿媳当工人，大孙子也当工人。孙女上高中，功课不好。小孙子顽皮，低能。他们还能自食其力，但我还是每月寄一点钱，叫他们积起来，将来男婚女嫁，也就不为难了。



话 黄 胄

绘画者，天才之事业也。我们河北蠡县梁家庄不过是个只有百多户人家的荒僻小村；而黄胄在我们老梁家弟兄行中，又是比较幼小的，却从童稚时就显示出这种艺术才能。他写大仿，常是中途辍笔，竟然画开了画儿。祖父是戏班会头，而戏班就在外院，所以黄胄那时也常画“戏子人”。他现在画的人物婀娜多姿，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吧。

黄胄八岁随母亲离开了出生他的冀中平原，浪迹在古关中地区。“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是古人所谓云树之思，友朋间的怀念。黄胄远在渭水之滨，我转战于冀中，却没有到过江东，但这种云树之思却常牵动我的感情。近年来，我们身居京、津两地，相距咫尺，这种感情仍然有增无已。

黄胄一去就是二十余载。五十年代初，一位老朋友、名记者方明对我说，北京有一个画家黄胄，听说话也是你们“大百尺”（村名）那里的口音。对于

“黄胄”其名，我当然不陌生。他的新疆风情画我看了不少，那种运用中国水墨画的精湛笔法，流动、酣畅的线条，大胆、瑰丽的设色，新奇的构图，所描绘的草原牧民生活和歌舞人物，绝非等闲画家所可望项背者，我当然印象难忘。究竟故乡谁能成为此大画家？想来想去，便想到可能是那个小兄弟“老傻”，因为只有他孜孜于习画，而他大哥也善挥洒丹青。彼时，拙作长篇小说《红旗谱》已一再刊行，出版社拟再印豪华本送瑞典做书展之用。编辑询问我，请谁绘制插图为宜，我就说北京有个画家黄胄，艺事精妙，听说是我们老乡，可能熟悉书中所写的风土人情。当时，黄胄未答应作插画，但他给北京和平画店打电话，说想见我一面。我便请画店转告也有此愿。我们终于见了面。黄胄一露面，我就看出来，不禁脱口而出：“你是‘老傻’！”吾弟虽长别二十余年，说话仍不失乡音，历述往事，倍为亲切。我到他家见了黄胄母亲——我的老婶子，一家子人同去吃了一顿饭，十分高兴。

我憨厚而又聪颖的小兄弟，能成就如此大的事业，全在于他的勤奋。为了画好《红旗谱》插图，他重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同亲人、老乡促膝相谈，重温了童年生活之梦。所以，黄胄为小说所绘插图，生

活气息浓厚，形象地再现了那风起云涌的年代，那又富庶又贫穷的土地。他笔下的人物是家乡的人物，笔下的事物是家乡的事物，完全是小说生活的补充，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小说中的人物春兰那幅画，在俏丽的外形下洋溢着冀中儿女的纯朴感情和青春气息，与其说它是从属于小说的插图，毋宁说是卓越的肖像描写，这真使拙作增添光彩。有意思的是，我的《红旗谱》在“文革”中受批判，黄胄也被株连，单是春兰这张成功之作，就批了一百二十场！

黄胄为了完成自己的事业，曾经千辛万苦深入生活。他的驴子何以描绘得那样栩栩如生，憨态可掬？据他说，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乡时，居室隔壁就是“打掌铺”（削蹄钉掌）的，小驴或则奋蹄摇尾，或者喷鼻长啸，或则倒地翻滚，他都一笔一笔而记之。在长期的生活与观察中，才创作出百态千姿的驴。前人绘驴，每以“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或“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的清隽冷瘦意境为尚；黄胄画驴却着力描绘这种动物与民间生活的联系，渲染驴子的稚憨神态。这一农家蠢物竟也登上大雅之堂，是我国传统绘画创作领域的一大扩展。

清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深入生活即师造化，创